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关系与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秦亚青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关系与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秦亚青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秦亚青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ISBN 978-7-208-10648-2

I. ①关… II. ①秦… III. ①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8996 号

责任编辑 龚 权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

关系与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秦亚青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259,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648-2/D·2062

定价 42.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师和学生们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冯绍雷 陈 昕

编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李敏焘 陈 昕 秦亚青

黄仁伟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去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

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割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疑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

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间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 5**

前言

—

我从2003年开始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的问题。2004年完成了一篇论文,即《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次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面。也是在这一年,有一件事情促使我在这方面做比较认真和严肃的深入思考,直接的起因是当时承担的一个项目。那一年,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考虑设立了一个研究课题,题目就是“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家关系理论”。这两位学者首先考虑到亚洲,并开始组织亚洲的学者进行研究。阿查亚和布赞分别在北京和我谈过这个项目,我觉得很有意思。2005年项目启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先是在新加坡开会,启动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都有一位学者参加,每人撰写一篇论文。经过两年的研究、讨论和论文撰写,2007年由《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出版专辑,发表了中国、印度、日本、新加坡学者撰写的四篇论文,也包含了阿查亚和布赞写的导论和结语。

这个项目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的目的是打破话语垄断,挖掘非西方的思想和智识资源,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学术话语垄断是阻碍学术进步、窒息学术活力的,一旦形成话语霸权,思想便没有了活水源头。同时,这个项目本身也为跨域西方和非西方界线的学术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平台。正如两位项目主持人所说的那样,这个项目的读者既是西方的读者,也是非西方的读者:

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本项目的目的是加大批评西方中心观以及因之产生的对世界历史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表述的力度。西方声称的普世主义其实是根植于特殊的历史经验的,……这就对在威斯特伐

利亚暗箱之外面向未来的思考构成了障碍。这一项目也希望能使西方读者了解与国际关系理论化相关的非西方的传统、叙事和历史。对于亚洲的读者来说,项目提出了“为什么鲜有明确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说明了什么样的资源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项目还开拓了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以便探索关于国际关系的思考为什么是现在这种状态。这本专辑的最终目的是激励非西方的声音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及智识资源带入关于国际关系学的争鸣之中。¹

两位学者的基本观点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西方的、非西方的都可以产生国际关系理论。我是赞成这种观点的,加入这个项目后,我写的是《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篇论文首先界定了两种理论,一种是行动导向的理论,一种是知识导向的理论。中国不乏第一种理论,但鲜有第二种理论。《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的理论就是指第二种理论,亦即知识导向的学理性理论。在分析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理论的时候,我以为中国传统上缺乏国际意识,西方理论话语的垄断,以及缺乏一个明确的理论硬核构成了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主要原因。同时。我也提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形成的三个来源。这三个来源包含了三对理念和实践。一是中国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这是历史的思想和实践;二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和革命实践,这是中国近代의思想和实践;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理念(包括学习西方的理论思想)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实践,这是中国最近30年的思想和实践。每一对思想和实践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我不是要评判这三对理念和实践的是非功过,而是认为这是中国近现代的重要思想理念和实践活动,必然会对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社会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²

在写这篇论文和一系列项目研讨的过程中,我产生了挖掘中国资源,借鉴西方理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想法。《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主要是分析“为什么”,而不是探讨“是什么”,因此,在写为什么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什么”?当时的想法是先从理论的核心问题入手,就写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一文,中心论点是要想形成国际关

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需要有一个鲜明的核心问题。进而,这个核心问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回顾中国近代史,我将这个问题称为中国的“百年困惑”,无论是因为自身原因,还是因为外在条件,这个问题始终困扰国人,也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理论化努力,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坚实的理论硬核并产生相应的成核现象,最终成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理论流派的理论体系。³这就是我当时想象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应该具有的核心问题。并且我也相信,中国有着丰厚的智识资源,从事着广阔的实践活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形成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⁴

2007—2008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应邀写一篇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文章,这使我有机会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30年发表在国际关系期刊上的、与理论相关的论文浏览一遍,当时查到的论文有1124篇。在浏览这些论文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问题,并且,从这些论文中既得到启迪,也发现问题。其中有一点印象最深,就是我们很少在理论化和概念化上面做出实质性的创新努力。我们的研究多止于经验层面,或是多借鉴现有理论,这当然主要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我们在理论方面的创新性贡献寥寥无几。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形而上层面的思考、概念化的意识、理论化的建构是最欠缺的东西。当时,有西方学者称我们的研究论文只不过是深刻一点的新闻报道。这话虽然很不好听,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想如果要形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可能更要在形而上的思考上下工夫。

二

人是有共性的。无论是在哪种文化中生长起来的人,都有着相似的地方,比如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需求,人都需要尊重。社会也是有共性的,无论是哪个社会,也都有着相似的地方,比如任何社会都会有规则、规范、制度,任何社会也都会有人情、亲情、感情等等。正因为如此,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总有一定的适用范畴。同时,人也是有差异的,比

如美国人爱自由、法国人爱浪漫、德国人严谨、日本人细致等等说法,反映了不同国度的人的不同特点。社会也是有差异的,比如西方社会结构如稻田中一捆一捆的稻秸,各自独立;中国社会如石子入水产生的涟漪,一环接一环。正因为如此,任何社会理论都有局限性,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普世理论。

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如同任何体系一样,开放则生、则繁荣;封闭则衰,则死灭。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也如同任何知识体系一样,百家争鸣则盛、则进步;万马齐喑则枯、则颓败。从二战以后到冷战结束,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了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基本上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两次大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初期,国际关系学界的论争还是跨大西洋的论战。两次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理想主义和欧洲(主要是英国)的现实主义之间展开了辩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的论战,美国威尔逊理想主义和以卡尔为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思想对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也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界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力的两大流派。第二次论战则是就方法论展开的。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与美国本土的传统派以及欧洲的传统派之间展开了大的论战,英国学派的重要学者布尔强调传统的、历史的、思辨的方式,美国的学者则强调经验的、实证的、近似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说,这两次辩论都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

其后的发展就基本上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自身的论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等等,虽然学术论证仍然在进行,并且不亚于前两次辩论的形式,但是,从文化视角来看,这更是一种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内部论争。围绕美国霸权这一重要问题,形成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围绕权力和制度的竞争,并且产生了影响力巨大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进而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这一理论的诞生确实是影响重大。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成为世界的重大问题,所有国家都面临全球化的机遇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的严峻挑战。制度主义的影响立即显现出来,几乎所有的全球治理的主流研究议程都开始遵循制度主义提供的解决

方案,在国际制度上面展开研究。韦沃尔(Ole Wæver)曾经将美国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称为“新新合成”,指出在理念上,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⁵后来展开的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也基本上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内部的论战。虽然建构主义研究在欧洲早就产生,虽然建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和理论在其他领域早就显现,但是,在美国,经过亚历山大·温特的科学化处理,才真正被接受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是“美国的社会科学”。正如美国学者霍夫曼所说,国际关系学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虽然开拓者是英国的卡尔,“但是,卡尔的开拓性努力并没有在英国开花结果。国际关系是在美国成为一个学科的”⁶。这个论断是很有道理的,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的宏理论也几乎都是在美国成型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简单地回顾这一段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不是要否定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实际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美国的理论研究二十年左右产生一个重大学派,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不经过美国学界的认可,很难进入国际关系的主流。美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者,创新意识和创新的知识产品都是不可否认的。虽然现在国际关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仍然是一门十分落后的学科,但是没有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世界的国际关系学可能仍然会附属于其他学科,连独立的地位都没有。如果我们将世界国际关系学形容为一个知识的大厦,美国学者对这座大厦的贡献是巨大的,美国的《国际组织》、《世界政治》等重要学术期刊也起到了引领学术议程、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来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不仅译介几乎全部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而且在理论研究议程上也反映出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影响。⁷这有着积极的一面: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到如何做学理性研究,也使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科具有更加独立的地位和更加明确的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一砖一瓦都要是美国制造的。如果是那样,则大厦就会出现风采大减、风格单一、风貌单调的

状态。如果我们承认实在的社会建构⁸,承认社会实践活动是理论的源泉,承认文化对于思维和行为的影响,那么,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会导致不同的实在建构和社会建构。换言之,人、社会、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社会理论的不同与创新,而人、社会、文化的共性可以使得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比如,理性选择理论抓住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利己特征,并以此为核心概念发展成为诸多理论的内核。正是由于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样的权衡式理性,所以,理性选择也就有了一定的普适性。不过,在重关系和重人情的社会中,理性可能会呈现另外的状态。比如,通过自己熟悉的人脉关系去实现某种利益,这就与个体社会中的个体理性不尽相同,可以称为“关系理性”。虽然都是理性,但理性的内容可能就不尽相同了。

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也是一样。我们以“均势”(balance of power)为例。“均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对于许多现实主义学者而言,均势意味着和平与稳定。所以,要看一个国际体系有没有和平和稳定的秩序,首先要看这个体系中有没有势力均衡的结构。古典均势理论强调体系中五个国家保持基本相当的实力。一方面,这五个国家之中,谁都不能成为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四国的超级大国。一旦出现一国坐大的迹象,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战争手段,削弱这个国家的实力,使其成为与其他诸多实力相当的国家。另一方面,这五个国家也不能彻底消灭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一国坐大,其他国家将其实力削弱,但不能将其彻底消灭,在这个国家恢复到与大家实力相当的时候,就要将其重新带回到体系中来,保持五国势力均衡的状态,也就是保持体系自身的均衡状态。显然,这是基于欧洲经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以个体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欧洲国际体系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均势维护了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体系的稳定又维护了每个主权国家的基本安全。梅特涅、俾斯麦等等政治家和战略家,都是玩弄势力均衡政治和外交的高手。到了美苏两极的冷战时期,均势理论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实践活动,又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均势的基本概念仍然是核心,但是,人们从多极均势发展出来两极均势的理论,并且加入核武器这一致命要素。反映到战略层面,就是“相互确保摧毁”:美苏两国

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势均力敌,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这样就保证了两个国家都不敢动用核武器,反倒维护了国际体系的稳定。

学者之所以能够将均势理论发展起来并使其成为现实主义理论极其重要的概念,正是因为有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历史,有了这些欧洲经验,有了欧洲主权国家和代表国家的政治家的实践活动。后来,又有了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史,更是使得均势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由于均势理论在权力分布与力量制衡问题上确实有着相当高的适用范围,因此也就被许多人视为普适性理论。均势理论被用来分析美苏核战略,分析东亚战略格局,分析南亚次大陆局势,等等不一。当人们以某种一统世界观来审视世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智识上的错觉,认为只有自身所处的经验场域才是真正的经验场域,其他经验场域或者只是时间上的先后、或者只是理念上的进步与落后形式,最终都会统一到自身的经验场域中来。于是,美国比较政治学主流理论的发展学派就认为西方的今天就是非洲的明天,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也认为,“今天的东亚就是昨日的欧洲”⁹。不关心其他文化的经历,不重视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否认其他文化不仅仅是时间差异也是生活方式和实践活动的差异,这样就会走向学术话语霸权,也就会使得知识大厦走向封闭和单一。这种唯一的认定只能形成学术专制,只能阻碍学术发展,也会是思想衰退和死亡的起始。

一些有非西方历史经验背景的学者以不同历史经验和互动实践对均势理论提出挑战。比如华裔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在他200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一书中使用了亚洲的经验,尤其是亚洲朝贡体系的历史,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均势理论的解释。康灿雄开篇即叙述了他的这项研究是怎样开始的。他说这一研究是受到阿龙·弗莱贝格(Aaron Freidberg)1993年的一篇文章的刺激,在那篇文章里,弗莱贝格提出,欧洲过去可能就是亚洲的未来。康灿雄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用欧洲过去来探讨亚洲的未来,而不用亚洲过去来探讨亚洲的未来呢?”进而,他又写道:“我越是研究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越是将亚洲过去与亚洲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我就越感到饶有兴趣”¹⁰。

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理论认为,在一个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崛

起会导致体系的不稳定,为了维护体系稳定,其他国家会采取结盟和制衡的战略,压制这个国家的崛起。但在《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这本书中,康灿雄发现在东亚历史上,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表述的、欧洲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那种结盟和制衡现象并没有发生,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联合起来抗衡中国,形成均势,而是出现与中国合作的现象。他认为,这不完全是利益使然,也不是势力均衡理论可以解释的现象,而是在不断的历史进程中、在不断的互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偏好。康灿雄的具体研究内容很多,尤其是对1300—1900年间东亚和欧洲秩序的比较研究,使他发现亚洲的战争明显少于欧洲,这些内容和发现的确很有启发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设计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来自于某种特定地域文化中的生活实践。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身份定位和偏好的形成。在历史上,亚洲各国的身份定位和偏好形成比起欧洲各国来更有利于和平与稳定,而身份定位和偏好正是在长期的互动实践中形成的。这就是以亚洲历史解释亚洲现实的研究构思和逻辑脉络。也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和设计,使得康灿雄通过使用亚洲的历史和实践活动,提出了一个与均势理论不同的模式。他针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我发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变量,比如均势和经济相互依赖,在[东亚]国家的权衡之中所占的地位相对较轻,这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在这一地区想要什么、怎样给自己定位,而不是抽象的势力均衡的概念。”¹¹

无独有偶,一位华裔学者许田波也有着相似的设计思路。她也是从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开始的。她发现,这一理论对欧洲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中国却是不适用的。在她2005年出版的著作《战争和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一书中,也是开篇伊始,她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学者和研究欧洲的学者把欧洲政治中的制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中国学者与汉学家却把强制性大一统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呢?”¹²换言之,制衡这个均势理论的核心概念适用于欧洲却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先秦时代与欧洲的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诸国相争的纷繁局面。正如许田波所说:“中国古代体系的确出现了国家之间竞争的进程,这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是

非常熟悉的事情。古代中国体系与欧洲早期的近代体系相似,经历了连年的战争、封建体制的解体、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形成、领土主权的产生、势力均衡的格局等。但是,这样的情景最终走向了大一统。很少有国际关系学者愿意正视这样一个令他们不安的事实。”¹³相似的体系条件却产生了不相似的结果:欧洲最后产生了以个体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中国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出现大一统的国家;欧洲产生了各方制衡的格局,而中国则产生了单方一统的格局。显然,许田波告诉大家的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现实,而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当时的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战略选择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解释。许田波在书中引用了另外一位华裔学者的话:

是到了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可以在其他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建构历史学理论。……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一样悠久厚重,但是,却没有得到同样的研究。……中国的历史记载可以对历史学理论做出重要的贡献:这些历史记载,通过坚实的数据,可以证实历史学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历史学理论,产生更广泛、更具效力的理论通则。¹⁴

许田波和康灿雄的研究理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和历史的感性认知,因为他们从这些感性认知上发现东方的历史和发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和预测不相吻合,所以,他们开始从东亚的视角、从中国的视角来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是思考均势这一国际关系重要理论的效度和信度问题。可能他们更多地从经验和历史的层面去审视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含蓄的预设:理论是从局部的经验和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是在历史和文化中建构的。首先,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其次,不同文化中的行为体会有不同的实践形态和生活方式;第三,一种实践场域中产生的理论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另外一种实践场域中的行为。对于许田波来说,制衡的经验是欧洲特有的,在中国就不是如此,因为中国的战略家采用了不同的战略;对于康灿雄来说,制衡的经验也是欧洲特有的,在东亚就不是如此,因为东亚的国家在东亚体系而不是欧洲体系中塑造了自己的身份和偏好。从这两项研究来看,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都会有文化局限性。人们将一些理论说成是普适